



“浙江新闻”客户端



“浙江法制报”微信

2版

新闻

欠薪不还? 职工申请“老东家”破产
这是绍兴首例职工申请企业破产案

12版

案卷

女青年朋友圈卖“壮阳药” 牵出亿元大案
这些药名字听着很劲爆,其实都是假的

深化融合发展战略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全国省级党报集团媒体融合研讨会在杭举行



《浙江日报》记者 翁浩浩 丁谨之

在融合中协同发展,在创新中寻求突破。12月6日,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融合、创新、突破——全国省级党报集团媒体融合研讨会”在杭州开幕。来自全国20余家省、市级报业集团(报社)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相聚在西子湖畔,就媒体融合交流经验做法、探讨发展趋势。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本次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总结交流省级党报集团推进媒体融合的经验做法,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规律,进一步凝聚共识,增强党报自信、融合自信和发展自信。

“十三五”时期,是传媒出版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各报业集团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的关键时期。近两年来,浙江以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和科学发展能力为核心,强化互联网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在推动传统主流媒体资源优化整合、拓展互联网新兴传播阵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着力构建以互联网传播为主要渠道、报纸传播为依托的新型传播格局。

与会嘉宾认为,推进媒体融合,要坚持党管媒体不动摇;媒

体融合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现实体现,是群众路线对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要做到“主流舆论、融媒传播”,把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坚决转战网上“主战场”;推进媒体融合,要加强创新政治话语体系,把握“时度效”、坚持改文风。

在主题论坛环节中,来自浙江、广东、湖北、四川、湖南、陕西、重庆、上海、福建、吉林、江西、天津、山西、山东、海南、河北、河南、广西、贵州、内蒙古、甘肃、西藏、江苏、云南等省(市、自治区)的报业集团(报社)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先后就媒体融合的内容建设、技术保障、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等热点话题作了深度交流,共同研究展望媒体融合的新趋势和新变化,探讨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



水美鱼鲜 人欢腾

通讯员 姚海翔 摄

昨日,德清县新安镇荷叶蒲漾开展今年的第一次围捕,近2万斤鲜鱼将运往杭州、上海等地。近年来,当地积极推进“五水共治”,荷叶蒲漾通过综合治理,水质得到明显改善,出产的水产品格外受到青睐。

虽然你无形,也要好好保护你

产权保护意见传递新信号,法律专家聚焦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记者 陈赛男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信心

公权力介入要“适度”

提到“产权”,很多人马上会想到房子、车子、存款、土地等有形的财产权。然而,随着社会创业创新意识的增强,人们的知识产权观念也在不断强化。

日前,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保护产权不仅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进一步强调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意见》的出台,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传递出哪些新信号?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来听听专家们怎么说。

省律协知识产权专委会主任、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主任黄妙,拿出了一份省律协知识产权专委会11月份提交的《浙江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在这份调研报告中,以浙江企业现阶段涉及最多的专利纠纷为例,44.68%的调研企业认为专利维权时的主要障碍是诉讼成本高,16.08%的调研企业认为主要障碍是法院判的赔偿金额过低。

黄妙解释说,随着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侵权人的反制手段亦逐步加强,导致被侵权人取证难度加大,易败诉,而败诉就要单方承担专利诉讼中可能产生的律师费用及侵权调查取证费用、诉讼费用等一系列诉讼成本。即使在成功维权的企业中,法院在判赔金额的确定及对合理费用的认定上,也远远低于维权企业研发投入成本及维权支出。

除上述两项障碍外,黄妙在经办知识产权案件中发现,企业在维权中还遭遇法院审理时间过长、侵权证据取证太难等障碍。“这些障碍令维权企业感到心寒,严重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阻碍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推进和提高。”黄妙说。

因而,在黄妙看来,《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极大增强了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信心,有效防止侵权人的肆意侵权,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勇于维权,这对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王坤认为,《意见》对于公权力机关在知识产权方面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比如,对于司法权而言,《意见》加大了法定赔偿额度,扩大了惩罚性赔偿范围,实际上也意味着扩大了司法权力,使得法官在处理知识产权司法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大增。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司法权的配置机制和运作程序等。

对于行政权的运用,《意见》提出了不少以往没有的新举措,比如建立收集假冒产品来源地信息工作机制,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情况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进一步推进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等。同时,《意见》要求行政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应用的机制和平台建设,加快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完善涉外知识产权执法机制,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等,都体现了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发挥作用。

王坤还表示,公权力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公权力对知识产权事业能够起到促进作用,鼓励创新、打击剽窃;如果运用不当、过度,公权力就有可能妨碍知识产权事业,对产权人、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创新活动,可能造成损害。所以,公权力参与的方式、范围、界限都需要准确把握,进行必要规范。“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如何有效运用公权力,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如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所当为、止于当止,需要持续探索。”王坤说。

(下转2版)